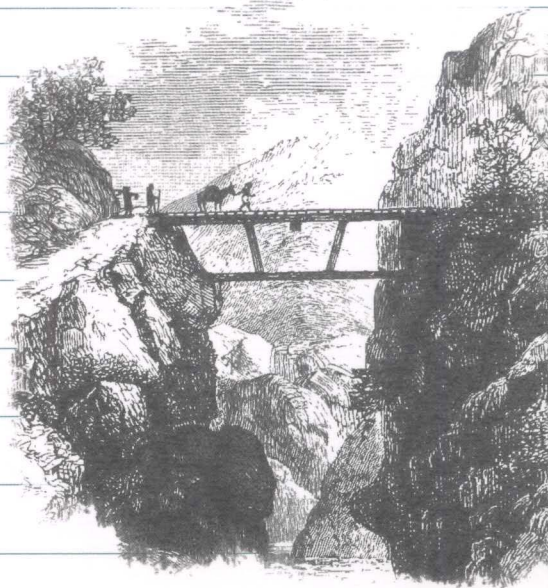


西 / 人 / 中 / 华 / 西 / 南 / 行 / 纪



# 金沙江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英] 威廉·吉尔 著

[英] 亨利·尤里 编

曾 嵘 译

Southwest China

 中国地图出版社

西人中华西南行纪

# 金沙江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Southwest China*

[英] 威廉·吉尔 著

[英] 亨利·尤里 编

曾 嵘 译

中国地图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沙江/(英)吉尔著;(英)尤里编;曾嵘译.--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7

(西人中华西南行纪)

书名原文: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ISBN 978-7-5031-7935-8

I.①金… II.①吉… ②尤… ③曾… III.①历史地理—西南地区—清后期 IV.①K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563号

策 划 鲁西奇 卜庆华  
责任编辑 赵 彬  
审 校 卜庆华  
出版审定 朱 萌  
装帧设计 方 芳  
地图插图 鲁西奇 姚维娜  
排 版 杨济瑜

---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3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83543926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220 mm × 169 mm	印 张	20.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42.00元

---

书 号 ISBN 978-7-5031-7935-8/K·4508

审图号 GS(2013)827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 曾嵘

曾嵘，AC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CISA（美国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196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于国家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现供职于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从2003年至今，业余翻译并发表了各类作品逾百万字，主要包括2004年翻译出版的《美国豪门家族传记译丛——方达家族传》、2008年翻译出版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精要》、2010至2012年分别于《译林》杂志翻译刊载长篇小说《暮色将近》、《死而无哀》等。

*William Gill*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Edited by  
*Henry Yule*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83

本书中的插图除注明的之外，皆根据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83年的英文版译出

##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华帝国的大门洞开，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的考察和观察所留下的文献记载，向来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大众较普遍的关注，也得到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专家的重视。本书是英国的威廉·吉尔上尉于1877年沿长江上溯到重庆，然后对从未有外国旅行者涉足的四川西部和藏区东部进行的考察，再沿着马可·波罗和马嘉理的足迹进入缅甸的旅程。书中记载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中国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官僚机构运作、社会习俗有文献价值。

本书可作为历史、地理、文化领域专业人士的研究参考资料，也适合对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文化感兴趣的大众阅读。

# 《西人中华西南行纪》译丛

## 出版说明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华帝国的大门洞开，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以及旅行者纷纷来到中国，其踪迹所至，遍及各地。从东南沿海的海港渔村，到西南边疆的热带雨林；从京师的宫殿书肆，到西北的边塞卡伦；从黄浦江畔的十里洋场，到香烟缭绕的布达拉宫，到处可以见到异域来客的身影。

进入中国的西方人，或身负探险、开辟商路之任，或献身宗教、志在传播“福音”，或秉承其国家意旨、肩负重要使命，或向往异域文化、决意探奇索隐，且大都禀性坚韧，意志坚强，故留下颇多有价值之记录。这些记录，或以西方人之知识体系与近代科学方法，观察中国之自然、人文与社会；或以异域文化与信仰之观念，凝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文化与信仰；或以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重要事件之当事人身份，叙述事件发生之经过及身处其间之感受……无论其所记内容属何方面，亦无论记录者对于中国与中国文化是否持有“同情”之态度，今日观之，凡此记录皆弥足珍贵之资料，或可补充中文记载之缺失，或得窥知前现代背景下中西文化之冲突碰撞之若干侧面，或得明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地社会生活之某些层面。

当然，由于长期以来的文化隔膜，以及西方人初入中国，远未能深刻准确地认识中国文化，而且很多来中国旅行与考察的西方人在中国居留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们记录下来，或仅是浮光掠影式的一瞥，或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之词，或者只凭一点粗浅认识即信口开河，妄作解人，而其中不免程度不同地显示出文化霸权与民族歧视的态度。以今日之眼光观之，这些记录所反映的民族狭隘与时代局限，是显而易见的，相信读者会有足够的智慧辨识并给予批判。

西方人在中国境内之考察、探险、旅行与生活，及其所留下的文献记载，向来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大众较普遍的关注。盖此一方面不独可见不同文化的冲撞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拒斥、彷徨、向往与奋进，故得到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之专家的重视；亦因其展示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群体在交汇之初的千姿百态，故亦受到社会大众之青睐。或正因此故，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即有译介西方人在中国行纪之举。近 30 年来，有关近代西方人中国行纪的译介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已译介之近代西人中国行纪约有 70 余种）。观已有之译介，就其所涉地域而言，多集中于华东（特别是上海）、华北（特别是北京）、华南（特别是广州）地区，西人在中国内陆腹地的行纪则较少。因此，本丛书主要译介晚清至民国初年西方外交人员、探险家、商业人员及科学家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旅行、探险与考察活动所留下的记录，重点放在对中国内地的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观察、分析与认识。在作者的选择方面，主要选择职业外交人员、商务人员及科学家、探险家的考察记录，以突出其科学性与系统性。由于原著都是 100 多年前出版的，作者也都是外国人，因此原著中对中国之地名、人名的拼写都与今日之拼写形式不同，有些历史地名演变后的归属已难与今日之行政归属完全对应，有些小地名在今之何处或与今地名之对应关系也尚待进一步考证；书中的计量单位不是英制的就是中国市制的，有些计量单位早已停止使用，其与今日之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关系也难以说清。因此，对于公众不太熟悉的中国县级及其以下的地名和外国地名（国名、首都名、省名除外）首次出现时括注了原文拼写，以方便有关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也方便有兴趣阅读原著的读者检索；在人名第一次出现时，通常使用音译的方法；对于计量单位的处理，凡是与现今的法定计量单位有换算关系的，皆在第一次出现时，加脚注说明其换算数值；但由于“气温”的华氏度与摄氏度的换算关系较复杂，故在首次出现时给出换算公式，以方便读者自行换算。

此外，书中涉及大段引用他人的文字或属于原著编者的说明性文字，皆用另一种字体编排。

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在书目的选择、译著学术价值的评判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考虑不够全面的地方；各书译者虽然都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与翻译工作者，翻译各书也都尽心尽力，但难免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2012年12月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威廉·约翰·吉尔 (William John Gill), 1843 年 9 月出生于印度班加罗尔 (Bangalore), 1862 年, 进入英国皇家军事学院。1873 年以后, 他曾前往波斯、中国、印度、巴尔干、土耳其和北非等地探险考察。1882 年, 英国入侵埃及, 吉尔前往西奈沙漠搜集情报, 于 8 月 11 日为贝都因人 (Bedouin) 所杀。

1877 年, 作者由上海经宜昌至重庆、自流井至成都, 后北上理番府、松潘厅、龙安府, 再回到成都, 然后从成都至雅州、打箭炉、理塘、巴塘, 再南下经过阿墩子、大理府、腾越, 到达八莫, 进入缅甸。本书就是作者上述旅行的记录。书中关于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记录较为详细, 可以视为 19 世纪中后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志。在吉尔之前, 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达过川西北地区。他也因此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巴黎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李希霍芬评论说: “吉尔上尉所取得的成果深深地吸引着我, 特别是成都以北地区以及打箭炉和阿墩子之间的旅程。他对人文和自然都有敏锐的观察力, 整个考察过程中, 他都力求精确, 坚持不懈……他对诸多地方高程的测定尤为重要。”正因如此, 我们决定将本书译成中文, 从而为文史研究者与旅行爱好者提供参考。

本书出版于 1883 年底, 是第二版。其初版有两卷, 内容较为繁杂, 于 1879 年在君士坦丁堡出版。其时吉尔并不在君士坦丁堡, 他把出版其著作的全权委托给由亨利·尤里 (Henry Yule) 上校, 由后者负责编集、整理, 并交涉出版事宜。亨利·尤里撰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引言——《地理概述》, 详细地叙述西方人对于长江上游特别是川、滇、藏毗邻区域的金沙江的探险与考察活动, 以明晰吉尔的旅行与考察所具有的意义。吉尔去世后, 出版商与其家人商量, 在初版的基础上, 委托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贝德禄 (Edward Colborne Baber) 加以删

节修订，出版了第二版。第二版增加了由亨利·尤里根据刊登在《皇家工程学会会刊》1882年12月号上的文稿编撰的吉尔的小传，并对初版中的《地理概述》作了补充修订。中译本即根据第二版译出。考虑到由亨利·尤里撰写的《地理概述》并非出自吉尔之手，且涉及较多的民族、宗教与政治问题，故在翻译中省略了这个引言。

作为一个探险家，吉尔在短暂的一生中，足迹遍及中亚、西亚、北非及中国的广大地区。本书虽然主要是其中国之行的记录，但亨利·尤里编撰的《吉尔上尉小传》，实际上已概括了吉尔一生中大部分的探险与考察历程，所以，本书涉及广大区域范围内差异巨大的地理、历史与文化面貌，也涉及19世纪中后期上述地区的很多重要历史事件。译者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仍感翻译本中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由于前面所述的特点，也导致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可想而知的难度。吉尔所行范围之广，其间百年沧桑，很多地方现今已不复存在或地名几经更替，而其在中国境内的旅行，也往往绕过大城市，不走寻常路，因此导致地名考据方面的困难，幸有厦门大学鲁西奇教授——细致考据，并为本书编制了3幅地图；此外，本书第六章引述了一首当年川人怒斥洋人的古体诗，由于目前已经无法找到原诗出处，特请云南统计局的李丁先生照原意挥就。而整个编校过程中，若无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各位编辑耐心审校、清绘插图，也必然无法圆满完成这一译作。

最后，由于此书译自《金沙江》第二版，因此书中的注释较为复杂。凡未加说明的皆是吉尔的原注，此外还有尤里和译者的注释，则分别进行了标注，特此说明。

曾嵘

2012年12月25日于北京

## 卷首语

吉尔 (F.E.M. Gill) 小姐期望出版《金沙江》一书的注释版，以缅怀其兄弟，并委托我承担这一艰巨工作，因此才有本书的出版计划。

众所周知，《金沙江》的初版过于繁复巨大，我们这一版本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任务，要避免原书中已发现的错误。但实际情况是，删节这样一本叙述性作品相当困难，尤其在作者已经辞世，无法指导这项工作的情况下更为艰难。幸好我们联系到了贝德禄 (Edward Colborne Baber) 先生，他曾被派驻北京，担任女王陛下驻北京公使馆秘书，现居英国，愿意承担这一工作，帮我解决了难题。贝德禄先生是吉尔上尉生前最亲密的朋友，曾给予他很多帮助，陪伴他沿扬子江上溯，并对中国西部及其相邻山地国家有着独特的理解，是这一工作最适合的人选。

吉尔小姐还希望本次出版也包含初版中的引言，我对其稍作修改以贴近时代。

此外，吉尔上尉的小传是基于一个当代作者于去年 12 月刊登在《皇家工程学会会刊》(一份在工程学会会员内部流通的刊物) 的文稿，又根据一些朋友的日记进行了扩展而写成的。

本文中的图片除了少数 1880 年版中的图片外，大部分都是根据吉尔上尉粗糙手稿中留下的观察草图绘制的。还有一些来自于克瑞尼 (G.Kreitner) 中尉关于塞钦伊伯爵 (Count Szechenyi) 探险之旅的著作《在遥远的东方》(IM Fernen Osten, Vienna 1881)。

亨利·尤里

1883 年 10 月 26 日，伦敦

## 吉尔上尉小传

威廉·约翰·吉尔(William John Gill, 以下简化为“威廉·吉尔”或“吉尔”。——译者)1843年出生于(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当时他的父亲,(英国驻印度军队)马德拉斯团的少校罗伯特·吉尔(Robert Gill),正在此地临时任职。吉尔少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临摹过阿旃陀(Ajanta)石窟寺墙壁上的古老图画,其作品曾被用于装饰西德纳姆(Sydenham)的水晶宫,后来在约十四五年前被东印度理事会借走,并在火灾中烧毁了,当然,他的画作并不是这次火灾的唯一损失。

威廉·吉尔在布赖顿(Brighton)学院就学,与他同时代的奥古斯塔·马嘉理(Augustus Margary)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后者比他先去中国并旅行到伊洛瓦底(Irawadi)江,他们的死因也很类似。

早在儿时,他的性格就显现出非常坚定、严肃、纯洁的一面。他惯于全心全意完成任务,非常善用时间,他的姐姐曾这样写道:

……当他还是布赖顿学院的小男孩儿时,就曾让我为他讲解学习卡片上写的“英国士兵应恪尽职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将卡片挂在卧室的墙壁上。

她说吉尔还设计了一套警报系统,这套系统每天早晨会自动地将被褥从他身上掀掉,他还有在早餐前工作很长时间的习惯。

后来,他被皇家军事学校录取,一边学习一边于1864年通过了皇家工程师的考试。1869年9月,他前往印度,在那里供职到1871年3月。回国前,他母亲的一位孤身远房亲戚,赠给他一笔丰厚的财产,当时在军队里,财产丰厚之人并不多见,因此这事或多或少有

些神秘之处<sup>[1]</sup>。这笔钱让吉尔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发挥了他与生俱来的强烈探索和冒险精神，并将其转换成当时最能报效祖国的方式。

他首次以旅行家的身份闻名，是因为参加了贝克 (V. Baker) 上校的波斯之行，后者于 1876 年发表了旅行记录《东方的乌云》。这次旅程从 1873 年 4 月到年底结束，一行人前往第比利斯 (Tiflis) 和巴库 (Baku)，随后穿过里海 (Caspian) 到达阿什乌德 (Ashurada) 和阿什拉巴德 (Astrabad)，发现无法如愿探索阿特勒克 (Atrek) 河谷后，就转而前往德黑兰，沿途还参观了阿什拉夫 (Ashraf) 著名的阿巴斯大帝 (Shah Abbas) 宫殿。我们从彼特罗·代拉·瓦勒 (Pietro Della Valle) 1618 年的文章中已经了解过有关这一朝廷很多有趣的细节，这种情况对旅行者来说非常少见。当然，彼特罗这样的作者也不常见，他总是写得很长，如同理查森 (Richardson) 的小说一样长，却从不令人厌倦。德黑兰之后的第一站是穿过该城市北部海拔 12 000 英尺<sup>[2]</sup> 的厄尔布尔士 (Elburz) 山脉，去寻找野山羊和摩弗伦羊。

下面是吉尔关于此行的一段记录：

山顶上布满了松动的山石。冬天，这至高之地寒冷异常；山上沟壑中的水

[1] 在我的请求下，吉尔上尉的遗嘱执行人索塔 (G.H.Sawtell) 先生热情地提供了如下信息：“柯库布里 (Kirkcudbright) 爵士的女儿艾利森·麦克莱伦 (Alison Maclellan)，大约在 1732 年嫁给了约翰·拉瑟弗德 (John Rutherford)，即拉瑟弗德爵士的儿子。他们的孙辈的一个分支也叫约翰·拉瑟弗德，是一位商人，约 60 年前去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另一分支有很多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了荷兰商人霍伊施 (Heusch) 先生，另一个嫁给了勒费夫尔 (Lefevre) 先生，他女儿就是吉尔太太的母亲。温布尔登的弗雷德里克·霍伊施 (Frederick Heusch)，也就是刚刚提到的霍伊施先生的孙子留下了遗嘱，指定吉尔上尉为其遗产受益人。弗雷德里克·霍伊施的妈妈从堂兄约翰·拉瑟弗德处继承了其一半财产。因此我敢断定，霍伊施先生在去世时，吉尔上校是与其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了。在贵族爵位书中并没有明确证明吉尔太太的母亲身份说明。有关柯库布里 (Kirkcudbright) 和拉瑟弗德的爵位问题，在上个世纪也颇多争议。”

[2] 1 英尺相当于 0.3048 米。——译者

流都已结冰，冰凌膨胀，让岩石支离破碎。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山下是虽广阔却贫瘠的平原，一望无际，朝着隐没在沙漠阴霾中的地平线延伸）是野山羊和摩弗伦羊的家园；通常，这里除了秃鹰因突然发现人类而发出的惊鸣外，几乎没有其他声响，偶尔岩石松动顺山势滚落，发出金属般的声音，这才让攀登者注意到一群动物在看似根本无法通行的悬崖上奔跑。

沿着宏伟的达马万德 (Demavend) 山，他们又下到马赞德兰 (Mazanderan) 茂密的丛林，之后又翻越了达姆甘 (Damghan) 山脉，并沿着呼罗珊 (Khorasan) 沙漠北部边缘的一条道路前行，马可·波罗和几年后的贝利·弗雷泽 (Baillie Fraser) 等很多旅行者都曾走过这条路。拜访了马什哈德 (Meshhed) 后，他们又一路北上，来到了著名的纳迪尔沙汗 (Nadir Shah) 的要塞纳地里堡<sup>[1]</sup>(Kila't)。

吉尔说纳地里堡是世界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它是个天然森林，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固若金汤之地，那就一定是纳地里堡了。拉塞拉斯 (Rasselas) 冒险故事中对欢乐谷的描述，正好是此地的写照。这是个极大的山谷，四周环山，外人绝对无法轻易进入。群山顶部尽是垂直陡峭的悬崖，有些甚至高达 200 ~ 300 英尺。进入山谷共有五条路，每条都必须穿过狭窄的峡谷，两面峻石如高墙般耸立。除了一条山溪穿流而过之外，谷中还有充足的泉水保证用水的需求……居民饲养牲畜，在山谷里种植谷物，因此没有饥谨之虞。

他们从这里向达雷加兹 (Darah -gaz) 地区前进，这一区域位于俯瞰土库曼草原的山脉北麓边缘肥沃的地带，居住着古老的库尔德人 (Kurds) 部落，当时正处于世袭的伊拉亚汗 (Ilayar Khan) 英明而有力的统治之下，非常繁荣。在这里，吉尔遭遇到一次差点要了他性命的意外枪伤，被迫休息了一段时间。

.....  
[1] 应为 Kalat-i-Nadiri 的简写。——译者

山坡因陡峭多石的沟壑而呈现破损状态，下山时要非常小心，需要顺着倾斜的岩石板块爬下来。看来吉尔摸索着下山时枪还上着膛，保险也是打开的。他把枪靠在一块突出的悬崖上，这时忽然发生了恐惧的事情：枪突然滑了下去，枪口朝上，一路下滑，然后就走火了，在不到3码<sup>[1]</sup>的地方直向他射击而来……他的一只高筒棕色皮马靴被射成了碎片。我们焦虑地将碎片清除，检查伤口……幸好静脉、动脉都没受损，真是万分侥幸。（摘自《东方的乌云》第200～201页）

在同书第224页，作者曾列举其伙伴在调研中的勤奋习惯：

吉尔的观察最为仔细勤勉，在几百英里的路程中，任何一个角度他都不会错过，前进中指南针和笔记本从不离手。

再次跨越这一著名的边境线库鲁德干（Kuren-Dagh）时，旅行者们探索了阿特勒克河（Atrek）上游地带，并转向西南经贾贾尔姆（Jájirm）到达了沙赫鲁德（Shahrúd），从马什哈德至德黑兰一段又回到大路上来。

1874年，在英国地理协会于贝尔法斯特（Belfast）举行的会议上，吉尔中尉宣读了一篇有关他此次旅行的简短有趣的文章。该文后来刊登在很有价值但现已停刊的《地理杂志》当年的10月号上，其中有一幅他画的路线图。这些认识，历经艰难才获得，尽管粗略，但其中的大量信息能纠正我们现有地理知识上的错误。吉尔一行回来时，圣约翰（St. John）少校（现在已经是奥利弗爵士了）正在印度事务部负责编制波斯新地图，他热情地证实说，吉尔手工绘制的路线图为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当时去过那一地区的人还很少。在此之前，虽然约翰·内伊（John M'Neill）先生曾于1838年造访过纳地里堡，已故的比克上校

.....  
[1] 1码相当于0.9144米。——译者

(Beake)<sup>[1]</sup>和其他一些人也曾去过，但直到吉尔回来之前，仍没人能准确探知其真实位置。历史上对这一地区的位置，一直存在两种说法。这一现象在探索性地理学中并不罕见，在地图上也被标识为不同的位置。达雷加兹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此前很多地图都标注过此地，但仅被认为是个小镇或村庄，而非拥有独立政府的广阔富饶之地<sup>[2]</sup>。贝克和吉尔对阿特勒克的真实位置和到达路径做出的修正，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约翰·奥利弗爵士的笔记里这样总结道：

大约 1869 年至 1870 年间，波斯王曾承认俄国人对阿特勒克河以北里海东岸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之后，波斯人却以毋庸置疑的事实，坚持他们认可的范围仅限于沿海区域；俄国人则认为他们在阿特勒克河以北所有土地的权利均已得到承认。

在吉尔旅行之前，阿特勒克在我们的地图上一直被标注为一条传统意义上的小河，其两岸有无数支流，其中，北岸支流较少，而南岸支流较多。波斯人居住的地区都处于河流之南。按照俄国人对协议的理解，似乎他们除了贫瘠的山脉和荒芜的沙漠外，别无所获。但吉尔和贝克却发现，阿特勒克的主流南面基本上没有支流，北面却有很多。距源头很远的北岸还有不少波斯城镇和乡村。他们发现达雷加兹这一整片区域其实清晰地处于河流北岸。这一结果让我们能用事实支持波斯人对这一流域的理解，迫使俄国人最终修改了他们的声明。

---

[1] 如果将比克 (Beake) 上校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一定会非常引人入胜。他本来在孟加拉军队担任副官，后来效力于呼罗珊 (Khorasan) 的阿巴斯·米尔扎 (Abbas Mirza) 的手下。阿巴斯准许他开采著名的内沙布尔 (Nishapur) 绿松石矿，并承诺给他特许经营权，但这一承诺始终没有兑现。在随后的几年里，比克上校参加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很多采矿项目。本书作者曾跟随他从巴勒摩到伦敦，他沿途对往事的回忆非常生动、有趣。他是已故著名的贝克博士 (Dr. Beked) 的兄弟，但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包括其姓氏的拼写方法。

[2] 贝利·弗雷泽 (Baillie Fraser) 曾两次前往呼罗珊，但均未获批准进入纳地里。他第二次旅行 (1833 年) 到了达雷加兹，但旅途中没带任何工具。



这位年轻军官所进行的另一项事业的性质则完全不同。1874年春天，皇家工程师学会主席出人意料地解散了这一组织，导致自己及下属均深受其害。之后，吉尔中尉向哈克尼(Hackney)市政府申请成为保守党候选人。在选举中，他的得票数最少，其中里德(Reed)获得6968票，霍尔姆斯(Holms)获得6893票，吉尔获得6310票。由于选票管理不善，这次投票被宣布无效。三个月后再次投票，吉尔与福塞特(Fawcett)和霍尔姆斯对阵。尽管他所获票数上升至8994张，却仍然失利。6年后，吉尔上尉参加了诺丁汉(Nottingham)大选，结果也以失败告终。这整个经历让他感到非常疲惫和厌恶，他说自己再也不会进行类似尝试了。

但哈克尼的人们却并没有忘记他，他落选之后8年，他的家人收到市政府写来的一封信，善意地向他表达致意。

作为他的同僚官员，我曾久闻吉尔的大名，了解他的波斯之旅以及他在哈克尼的失利，但我们直到1876年5月才得以相见。当时我还在印度事务部，他前来拜访，告诉我他正考虑进行从中国西部进入藏区，或进入新疆的探险之旅，想咨询我的意见。我给他的一个建议是让他熟读马可·波罗的游记。他非常珍视这个意见，在整个旅途中都照做无误。我还介绍他认识了两个能和他分享很多实际经验的人，即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 Richthofen)和库伯(T.T. Cooper)。

关于李希霍芬男爵，请容许我摘录如下一段文字：

确实，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晚间会议上宣布他的到来并不会吸引人们到门口观望，更不需要安排额外的警力确保通行，大贵族们也没有兴趣聚在圣詹姆斯大厅恭候……但毋庸置疑，他是自洪堡(Humboldt)开辟了地理探险的黄金岁月之后，集伟大的旅行家、伟大的自然地理学家以及有造诣的作家于一身之人，只不过尚未为人所知而已。谈到他在中国的旅行，在为数众多的旅行者中，他